

“总统封口门”让巴西走向分裂

■ 贾晓静

有“前总统掘墓人”之称的巴西总统特梅尔站在被弹劾的深渊前。

一年前，总统罗塞夫被指责修饰公共账目而遭弹劾，其副手特梅尔临阵“反水”，加速了“巴西铁娘子”的垮台。如今，登上总统宝座不满一年的特梅尔，也遭遇了与前任相似的处境。

示威人士在巴西各地集会抗议总统“封口费”丑闻，要求特梅尔辞职或被罢黜。专家指出，特梅尔政府的根基本就因经济衰退而不稳固，丑闻更是削弱了其改革的努力。

“你可以赶我下台，但我不辞职”

5月18日，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埃德森·法金下令对总统特梅尔展开刑事调查，特梅尔成为贪腐案嫌疑人。

此前一天，据巴西《环球报》披露，该国肉类生产加工企业JBS集团负责人若埃斯利·巴蒂斯塔向司法机关检举特梅尔，并提交了一段在3月

录下的谈话录音。录音中，特梅尔要求这家企业每月向狱中的众议院前议长库尼亚支付一笔“封口费”，以换取后者在狱中“继续保持沉默”。

“封口门”立即引发巴西舆论哗然。“这条新闻犹如在巴西投放了一颗原子弹。”反对党议员亚历山德罗·莫龙告诉英国《经济学者》杂志。曾任巴西环境部长的马丽娜·斯威亚迅速在脸谱网上发表视频称“这个国家正经历巨震”，“现总统不再有权统治巴西”。

这无疑 是特梅尔政府上台以来面临的 最大挑战。向来行事谨慎的他以公开讲话否认曾犯下任何形式的罪行，称录音纯属“欺诈”，并向警方指出录音中存在15处疑点，要求停止对自己进行调查。

之后，这位政坛老将对全国发表了5分钟的讲话，再次强调自己不仅没做任何违法的事，还帮助巴西扭转经济停滞的局面。“我没有试图对任

何人封口。”特梅尔说，“如果你想，你可以赶我下台，但我不会辞职。”这一次，他表示欢迎司法界展开调查。

政府出现分裂迹象

“封口门”调查撕开了巴西政坛表面的平静。事实上，特梅尔自上台之日起就一直与贪腐丑闻如影随形。

路透社指出，丑闻爆发前，内阁已有1/3的部长涉及贪腐案调查。特梅尔的嫌疑令他面临提前下台的危机，而昔日的“亲密盟友”库尼亚多次表示，一旦他向司法机构作证，包括特梅尔在内的多名政府领导人将难以保全。

不过，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看来，不同于罗塞夫，特梅尔有机会免遭弹劾，因为他的党派仍然能控制议会。该报援引特梅尔一名密友的话称，特梅尔已做好保释的准备，尽管他还在高呼清白。

怕闹鬼，安倍拒入首相公邸

■ 卢昊

据日本J-cast网站5月23日报道，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居然长期住私宅，每天乘专车上下班，这遭到在野党批评，认为首相拒绝入住政府安排的首相公邸“有违常理”，不利于紧急事态下的危机处理。政府和执政党对此反驳说，首相住在自己家里“不会耽误事情”。日本舆论则大多认为，首相为什么拒绝住在公邸“原因不明”，在野党的批评确实有道理。

J-cast网站说，在5月18日的参院预算委员会上，民进党议员福山哲郎说：“（5月14日凌晨朝鲜有动作时）安倍首相到达官邸时间为6时41分……如果首都圈发生大地震，首相的专车怎么到达官邸？道路情况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对此，官房副长官野上浩太郎代表政府回复说：“为了应对紧急事态，（政府）已经准备万全之策。（首相）在危机发生时能够及时给出判断、控制事态，这和人在哪里没有关系。”

安倍晋三2012年底再次执政以来，除国会会期繁忙期间，一般都住在东京涩谷区富谷的豪华私宅里，每天乘专车往返于私宅和永田町首相官邸（首相办公室）之间，车程大约15分钟。其实，首相公邸（住

宅）与官邸只一步之遥。2006年9月至2007年8月，安倍第一次执政期间基本都住在首相公邸。关于安倍坚持住私宅不住首相公邸的理由，有一种说法是首相公邸闹鬼。5月22日，民进党干事长、原首相野田佳彦被记者提问“首相公邸是不是闹鬼”，野田说：“没见过（闹鬼），应该没有这种事。”他还说：“（首相）住在公邸才是规矩，办公室和住宅近邻，步行就能到达。”当晚，记者将野田的话转述给官房长官菅义伟，菅义伟则表示“没有听过这种话”。

除“闹鬼说”外，日本舆论还有其他关于安倍不愿住首相公邸的猜测。比如第一次执政失败的“迷信”，住首相公邸带来厄运；来自家族的压力，特别是安倍母亲洋子不愿让儿子脱离自己的“管控”；还有说法是，安倍这样“仅仅是习惯，为了舒服”。

J-cast网站说，无论真实原因如何，安倍的做法成为在野党和反对者攻击他的理由。首相住不住公邸在制度上并无强制性的规定，但不住确实不符合管理规定，至少不利于他在紧急事态时第一时间到达办公室，不能给民众“首相迅速赶到前线指挥”的印象。

（据人民网）

流失在西方的千万件中国文物

■ 李夏恩

5月18日是第41个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将今年的主题定为“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或许，流失海外博物馆的千万件中国国宝所经历的痛史也属其中。当这些历尽沧桑、远离故土的中国文物被赋予“洗雪国耻，振兴中华”的使命时，我们当以何种心态去面对它本身所传达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呢？

西方以藏有中国文物为荣

国家博物馆展厅里，昏暗的灯光下，讲解员扬起手臂，又重重地落下，面色激动地看着对面的参观者，试图寻求同样的情绪。围拢过来的参观者们严肃地点点头，歪着脑袋，想要躲过他挥舞的手臂以便看清玻璃展柜里那尊精致的陶俑。而留着两撇小胡子的陶俑，面带笑靥，看着背对着他以及面对着他的所有人。

这尊陶俑之所以引起讲解员如此激动的情绪，是因为这件蜚声于世的唐代文官俑，并不属于中国，而是正在举办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特展中的一件。

据策展人、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闫志介绍，这次展览共有8件中国文物，占展品的十分之一。这些文物的所属无疑戳中了爱国心的痛处：当讲解员挥舞着手臂表达自己的“心痛”时，当参观者站在这座虽然地处中国，却无异于大英博物馆飞地的展厅里，隔着防弹玻璃罩凝视着这些在一个世纪前远离故土的中国文物时，心中自然而然会生出一种尴尬的耻辱感，甚至是一种激愤。

在西方博物馆里参观的中国游客感受到家乡熟悉气息的几率非常高，几乎每座大博物馆都以藏有中国文物为荣。许多中国教科书上的中国文物珍品都收藏于西方博物馆。

“飞夺泸定桥”从命名到传播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35年5月29日，长征中的红军惊险奇绝地夺取了泸定桥，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彭加伦以一篇题为《飞夺泸定桥》的短文记述了这段战事，收录在1937年2月于延安编成、1942年正式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中。

195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20

如果想要欣赏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翩若惊鸿的妙笔丹青，可以到美国弗利尔与塞克勒美术馆，宋摹本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他的另一幅著名作品《女史箴图》，则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北齐丹青圣手杨子华仅存的传世摹本《北齐校书图》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该美术馆还藏有一系列令中国人闻名震惊的名家巨作：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张萱的《捣练图》、宋徽宗的《五色鹦鹉图》。

比起这些“正常”的收藏品，有些在中国人看来稀奇古怪甚至触碰忌讳的文物，也被这些百无禁忌的西方博物馆搜罗拿下。

在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中有一座“中国庙宇室”的展厅，所用的建筑材料分别来自于清西陵和北京的智化寺。而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竟然陈列着一组完整的清初贵族坟墓，从墓门，到墓道两旁的石像生，到坟前的石五供，再到被石砖垒起来的宝顶（坟头），一应俱全。如果不是因为它陈列在展厅内部，真会让人以为是误穿越到了某个中国古代陵园。

里应外合的偷运行动

一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那尊被置于展厅显要位置的唐代文官俑一样，这些流入西方博物馆的中国文物的来源犹如一块尴尬的旧伤疤，每次揭开都难免会引起一阵义愤的痉挛。唐太宗昭陵六骏流失海外全过程就是一个典型。

宾州大学博物馆里两尊“来自中国古代都西安的高浮雕骏马”，正是唐太宗昭陵神道两旁陈列的六尊石雕骏马中的两尊“飒露紫”和“拳毛騧”。它们的最先发现者，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1907年，沙畹在前往陕西出差的路上发现了昭陵六骏。由于当时关于

“飞夺泸定桥”30年后始“扬名”

周年，人民出版社以《红军长征记》为主体编辑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广大读者才知道了彭加伦以“飞夺泸定桥”命名记述的长征战事。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结尾附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在叙述中已经用了“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后来习用的表述，但在述及夺取泸定桥时却说“强占了泸定桥天险”，可见“飞夺泸定桥”此时还没有

六骏的记述仅见于唐宋文献和碑刻，实物的发现令他喜出望外。作为19世纪与20世纪最出色的汉学家和考古学家，沙畹没有移动或带走这些珍贵的石雕，而是把它们拍摄下来，洗成照片，加以研究论述，出版刊行。

沙畹的学生谢阁兰细致入微地记述了老师的惊喜之情，但他没有提到的是，那栋发现昭陵六骏的“破败的建筑”，更准确的说法是“破败的茅厕”。沙畹将昭陵六骏从历史的尘埃（或许还有便溺）中拯救出来，他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达成，但对西方的古董商人来说，这才刚刚开始。

发现昭陵六骏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法国古董商人保尔·马龙的耳中，他被认为是第一个试图“买下”昭陵六骏的人。1912年，马龙派出古董商葛杨负责承办此事，后者又派出搭档高冷之前往调查，他们决定在1913年5月将昭陵六骏移出昭陵。

据陕西省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考察，这次盗运显然得到了当地官方的默许，亲历此事的当地人回忆“有县政府的人”，还有“省上的人”。一共有四个大车，“是用骡子拉的，一车套四个骡子，硬轱辘车，拿不上的打碎再拿走，能拿上的就没打”。

尽管有当地官方里应外合，但这次偷运行动并不成功。马龙后来记述：“在被盗运出来的途中，不幸走漏了风声，盗运者遭到当地村民堵截。为夺路逃命，盗运者将文物丢下山坡。损毁的石刻残片被当局没收，1917年被运到西安府博物馆保存。”

马龙没有得到这六尊宝骏，还损失了一大笔定金，但是他的偷运行为却让它们离开了原来的地方。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一场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受损严重的六骏石雕中的两尊——“飒露紫”和“拳毛騧”被陕军第一师师长张云山放在督署院里当做摆设，

成为惯用表述。1964年9月，空政文工团以中国民族艺术团的对外名义出访，进行交流演出。演出节目中就包括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审查通过的舞蹈《飞夺泸定桥》。由此，“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以艺术的方式在国际上得以传播。

“飞夺泸定桥”这一命名的进一步传播，得益于1965年8月6日杨

张死后又落入陕西督军陆建章手中，后者继而将其献给袁世凯。于是，这两匹唐太宗座下宝马，就成了袁家的御用摆设。押运二骏石雕的文件上还盖有袁家的印章，以保证一路上不会有不知分寸的家伙半路拦截。

“合法买来”的中国文物

仔细考察那些收藏在西方博物馆的中国文物的经历，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个中国人的名字。

两匹骏马运抵北京后，很快就和中国大古董商卢芹斋联系在一起。这位出身农家的古董商通过一位叫黄诃舫的中间商购得了两匹骏马，再偷运到美国。卢芹斋为他的这次冒险获得了12.5万美元的高额回报，而宾州大学博物馆则获得了曾被中国帝王拥有的两匹骏马。按照当时的法律，这些文物的来源都是“合法”的。这是西方博物馆最不容置疑的一点。

因此，1978年10月，美国汉代考察访华团访问西安时，随团的宾州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卜德对陕西省博物馆里昭陵六骏的说明极度不满，因为它提到宾州大学一位叫“毕士博”（即毕安祺的音译）的“美帝国主义文化强盗”“参加盗去”了二骏石雕。由于卜德早就听说这一说法，来华前，他特意复印了一份足以证明宾州大学博物馆绝非强盗小偷的关键证据：一张卢芹斋开给宾州大学博物馆的购物发票。

当然，卜德意想不到的，这两匹骏马的流落他处的命运，早在一千二百年前，就被它们的主人唐太宗自己“预言”了：“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物品可以永久地属于一个主人。然而，文物除外。

（据《凤凰周刊》）

（新华社供稿）